

■灯下漫笔

自不待言，世人普遍敬重、仰慕大师，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高屋建瓴，别树健帜，以思想前卫、见识超群、格局创新而被树为一个时代的界碑彪炳于史册。我认为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大师的人格魅力，其为人谦恭，虚怀若谷，求真务实，不媚权势，臣服真理，将毕生精力和智慧贡献给自己心仪的事业，当是令人肃然起敬！

大师的斐然实绩不止是影响他所在的年代，还将遗泽于后世。有鉴于此，大师生前往往很注重自己产下的“宁馨儿”，不使瑕疵误人，不以谬讹祸世。北宋古文运动的代表欧阳修，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和“千古文章四大家”，其散文创作的卓然成就与其革新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，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。据明代何良俊所撰《四友斋丛说》记载：欧阳修晚年审定生平所有文章时，逐字逐句地改，且一改再改，改了又改，堪为“一丝不苟”。其间，他还常常是搁一搁，等一等，让时间过滤一阵子，检验之后再拿出来重改，不厌其烦。其夫人劝止：“何自若如

此，尚畏先生嗔耶？”答曰：“不畏先生嗔，却怕后生笑。”畏惧先生嗔怒，顾及的仅是一时的个人面子；而生怕后人耻笑，则是担心误人子弟、遗毒后世。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驱使这位文学大师暮年依然精益求精，谨慎为文。

无论那个知识领域，大师们都是矢志不渝地孜孜追求两个字：真理，通过自己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心力日臻“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”的完美境界。尤其是科学研究，其结果并不存在绝对的真理，纠错则是科学界的常态；唯有纠错才不会导致“后生笑”。裴锡圭研究了 60 多年的古文字学，是公认的当代考古领域的泰斗，但他生怕“后生笑”而坦然认错、决然改错。位于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的大河口西周墓地从 2009 年开始考古挖掘，发现墓葬 615 座、车马坑 22 座，首次发现西周时期三足铜盂等珍稀古物，被列入“2010 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。裴锡圭在 2012 年第三期《中国史研究》杂志上发表了论文《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鸟

形盂铭文解释》，对出土盂铭逐句加以解读。其中有一个“𪔐”字，裴锡圭认为是“并”之异体字。时隔 6 年，《考古学报》公布了大河口西周墓地随葬青铜器的全部资料。根据这些发表的照片和拓本细审，裴锡圭惊诧不已，原来那个字确实应该解释为“𪔐”（古代车厢后面的遮蔽物），而非原先推断的“并”字变体。仅仅是区区一个瑕疵，裴锡圭却来了个“小题大做”：他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官网刊出《大河口西周墓地 2002 号出土鸟形盂铭文解释》，慎重宣布自己 2012 年发表的那篇论文“所论全误”，“拙文可谓毫无是处，自应作废，以后编文集也不收入”。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的裴锡圭忌憚“后生笑”而彻底推翻自己以往的断论，委实难能可贵，彰显出“高逸学者之风”。

倘若不被“后生笑”，任何科学结论或学术定论都亟待经受历史的考问和实践的检验。其逻辑前提是必须摒弃“唯我独尊”的思维，除了以平等的姿态相互切磋外，还得营造质疑、讨论、

批评的氛围。大师们亦然。诚如萨义德在《知识分子论》一书中所说：“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了提升生命。”这里不妨说说张中行。这位大师在上世纪末给《文汇报·笔会》撰文，认为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，除了效忠一君，君败亡则竭力致死和灭迹山林之外，可以走冯道的第三条路。黄裳旋即在“笔会”撰文批评，并以汪精卫和钱谦益在家国危亡之际的表现，说明走第三条路的危害性。面对如此言辞激烈的批评，张中行并没有勃然大怒，予以反驳，而是在认真反思后，给“笔会”编辑致函：“拙作确有不妥处，年来老境颓唐，丢三落四，以致立论时只顾及原其不殉节，而说得偏激片面”，检讨自己“失误很多而成就很少，人视为失误，正是言必有中，心是不会不安然的”，并要求编辑公开发表此函。黄裳和张中行，乃是大师邂逅大师——一方是提升生命式的批评，一方是怀揣生命被提升的意识来接受批评。这无疑是对“批评”一词的完美诠释。

大师亦怕“后生笑”，那么后生呢，当以这些高风亮节的大师为楷模。

初心砥柱

□王 贺

一百多年前，中国人民似乎有很多选择。

清政府灭亡后军阀四起，它们背靠列强、鱼肉人民、征战不休，历史书中“军阀混战”四个字背后隐藏的是烽火连天、民不聊生。民国时期一度存在一百多个政党，这些政党团体主张不同、行事各异，但对于实现民族解放与国家振兴又都无能为力。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，在对泱泱大国出路何在的求索与追问里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历史与时代的舞台。

位于上海兴业路 76 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庄严肃穆。这是中国革命历程的光辉起点，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开启了百年征程，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走向独立富强，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。这次会议确定了党的名称为“中国共产党”，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，明确“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”，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，直到阶级斗争结束”，“消灭资本家私有制”，以及联合第三国际。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，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，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。

百年接续奋斗，成就世界当惊。百年来，我们党由建党时的 50 多人发展壮大为今天拥有 9100 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，并带领有着 5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难关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奇迹。千秋伟业，百年正是风华正茂。从石库门到天安门，从兴业路到复兴路，我们党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、进行的一切斗争、作出的一切牺牲，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。正是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，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，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，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。

今日之责任，正在我青年。党的一百年，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，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，是铸造辉煌开创未来的一百年。今天，历史的画卷已经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，承载着 14 亿人口的巨轮即将驶向下一个深水区。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”，新征程上，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，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，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。

■八面来风

一封来自派出所的信

□朱亚夫

年末整理书刊，翻到一封纸色泛黄、来自“上海市宝山县公安局”的信，有些疑惑，拿出信纸一看，原来是宝山县公安局工农派出所所长的来信，于是一桩 60 年前祖宅纹圈房子失窃案，浮上心头。

笔者从小成长在上海本地老房子——纹圈房子中，它建于清末民初，位于当时城乡结合部的四平路西面，故由宝山县公安局工农派出所管辖，据史载这是为数不多的离市区最近的纹圈房子。纹圈房在外部墙上，筑有一层竹条斜纹编结的护墙篱笆，上海人称之为“钱篱笆”。

为何纹圈房子在外部墙上复有钱篱笆呢？原来纹圈房所用的砖头大多是小青砖，而且砌单墙。这种墙，墙体单薄，容易被窃贼“掘壁洞”（在墙壁上挖洞），因此往往要在外墙上筑钱篱笆，这样既防雨水冲击墙壁，也可防盗贼。可是毕竟是老房子，架不住窃贼的“掘壁洞”之灾。

那是在 1962 年，当时我投笔从戎在福建，海峡对岸的蒋介石见大陆遭遇三年自然灾害，趁机蠢蠢欲动，叫嚣反攻大陆云云。故当时称福建为前线。一天，我接到家人来信说老家纹圈房失窃，原来纹圈房灶间“腰脊门”门槛较高，门槛下约有一尺高低的墙壁，未筑上钱

篱笆，贼骨头正是从这里下手“掘壁洞”，进入我家偷盗的。当时我家已迁入虹口海伦路，老宅纹圈房空关着，盗贼正好下手。向警方报案后迟迟未见破案，于是写信告诉了远在海防的我。接信后，我写了封投诉信给工农派出所，说：我在前线为祖国站岗放哨，想不到后方自己家却遭贼人毒手，这怎能叫我安心站岗放哨，放心保家卫国……

工农派出所接信后，非常重视，从信上所述，钱瑞珍所长当年 8 月 31 日接到来信，她 9 月 1 日就回信，向我介绍了破案情况：“当你家发生案件后向我所报案，当急（即）派同志前往你家看现场，第二天又有两个同志去你家看现场。事后根据群众所提供的情况，作了分析研究，还多方面开展调查，据群众提供的资料都作了研究，找出了可疑对象，进行了多次谈话后，只承认偷丢下来十六斤左右的小麦，现已交出，其他的物资他一口否认……”，最后表示“希望你在前方安心工作，对你家的事情，仅（尽）我们所有的力量把此事搞清。”看来我家报案后，派出所做了不少工作，因未最后结案，故未及时向我家通报，造成了误会。

60 年后读这封来信，深感当时警方对党的“拥军优属”政策还是很重视的。虽然小偷避重就轻，只承认偷麦子（当年粮食金贵，要凭票供应），其实我家还失窃贵重的铜钱剑（全部用古钱组装而成）等。但是你看，报案后，立即派警员勘察现场，并深入群众排摸线索；发现嫌疑人，多次谈话；接到现役军人来信，所长亲自回信；信末不仅盖有所长私章，还有手注“钱瑞珍同志是本所所长”字样，并戴上公章，形同外调材料，等等。对破案工作认真负责，对定案结论十分慎重。这样的工作态度是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。



■清风歌

言心哲先生的“光荣出席”

□司徒伟智

湮，难道不是吗？

言老被湮没的劳绩，非止一端。记得早在 8 年前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，就有刘拥华的《“缺席”的言心哲先生》指出，作为“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学者群中杰出的一员”，遗憾的是“言心哲先生在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社会学的叙事中，就显得比较落寞，重要性得不到应有的体现，处于‘缺场’的状态。他关于社会事业、人口问题、农村社会学、社会调查等方面的著作和观点，以及他在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中的作用，都没有获得严肃的对待，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学的损失。”我读后，是赞同而受启发的。

好在，“缺席”是暂时的。学术乃天下之公器。以一个长的时间跨度来观照，站上一百年的高度，学界的评价终究会显示出公正不偏。经由上海市社联认真组织充分而广泛的评选，现今言心哲先生成沪上已故“68 位社科大师”之一。笔者在好些场合，看到了对于言老的宣传、礼敬。堪谓光荣“出席”，

名列仙班！

市社联做了件大好事。我很有他老人家高兴。

又不止是一个人的高兴。高兴的是，致力于社会建设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，业已成为国家战略。凭藉聚焦研究社会行为与人类群体的专业特点，社会学在现代城乡建设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，由遭遇“停摆”命运之“丑小鸭”，终成社科界的“金孔雀”。用恩格斯的话说，社会一旦有需要，会“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”。从社会学的蓬勃推进，从一位位社会学大师的重焕光芒，你我分明听到了这鲜明的社会需要呼声。

有学者赞扬言老著述，“论数量不算多，但对于社会学这门学科而言，却有着积基树本的意义”，诚哉斯言。从网上搜一下，可以看到多地皆有专业学报的论文，研究学习言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特色。建议还可将言先生的论著选译一番，予以重版，以饕后学。总之该让他的学术成果多多“光荣出席”。

